

学林

← (上接9版)

“访菊生、弟三、书衡，暮归”（《夏曾佑集》下册，第708页）。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幼博、康广仁。夏在京停留的三四天中，天天与张元济、康有为等见面，谈什么，日记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都是变法维新的大事。不能排除康广仁在京的半年多时间内与张元济见过面。至于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也没有发现张元济与他们直接交往的史料，情况可能相同。这一群时代浪潮弄潮儿虽然主张不尽相同，经历、贡献与最后归宿各异，但是他们当时求新求变、救亡图存的改革信念是一致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实行变法。13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先后被光绪召见。就在康、张被召见的当日，帝党首领翁同龢被逐出京，张元济就意识到朝局会有重大变化。虽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派不断上奏折，向光绪提出变法主张；然而，后党已密谋政变。果然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深秀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24岁。

这一切，对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

聊尽后死者之责任

戊戌政变的深刻教训让张元济记忆犹新，终生不能忘怀。1903年初，他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的职务，担任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同年8月，就把戊戌政变写入由他撰序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上下两册，起自“三皇制作”，下迄“两宫回銮”。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内容，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戊戌变政”一节曰：

光绪二十四年，皇上忧国事之日非，锐意振兴。除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四品卿，使参预新政。继又命康有为督办官报。此外名士多不此擢用。夏秋

数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废八股，改文武科举章程，使归实用；诏海内士民上书，广开言路；诏京师及各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学者以次递升，予以出身，以奖励实学；废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庙寺观，尽改学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褒奖专利；裁汰诸冗员，又裁减无用之兵。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折，报馆、学堂、学会亦次第兴办。（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12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戊戌维新的首次记载。离政变发生仅仅过了五年！在党锢未开之时，能有如此精辟评述，虽则该教科书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但我真怀疑它出自张元济之手笔。

民国初的1913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第3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子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1916年，他把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提到了议事日程。

民国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同在上海居住，两人时有往还。1916年11月21日，康有为约张元济往其寓所晚餐（《张元济日记》云：“康长素约在伊家晚饭。遇龙伯训、邝善甫及徐君勉之子。”《张元济全集》第6卷第129页），很可能谈到了辑集六君子遗著的事，因为同年12月23日，张日记“编译”栏记云：“拟印《戊戌六君子集》。函询长素，伊弟及杨深秀有无遗著。”（同上，第135页）上日张赴海盐扫墓并为公司事在杭州停留数日刚回上海，是否六君子其他几位遗著已部分落实了呢？从张后来为《戊戌六君子遗集》所撰的序言知道，他通过朱祖谋、王乃澂、王式通、李拔可、何天柱等人已得到谭嗣同、林旭、杨锐等人的诗文，独缺康广仁与杨深秀，才向康有为求助，无奈康有为也没能提供其弟的著述。

朱祖谋，字古微，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官至礼部右侍郎，著名词人，曾上书反对仇教开衅，触怒西太后，几获罪。王乃澂，字聘三、病山，四川中江人，历官知府、布政使等。王式通，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原籍浙江绍兴，历任编书局、学务处等职。李拔可，名宣龔，福建闽县人，任商务印书馆协理、经理等职。何天柱（澄意），广东香山人，履历不详，民国后曾编有《三名臣书牒》。张元济为辑编《戊戌六

君子遗集》可谓煞费苦心，正是为了聊尽后死者之责任。

唯一一部六君子合集

丁巳十二月（1918年1月）《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六册，该书集中了当时能得到的六君子遗文遗诗，加以汇集。全书包括谭嗣同《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三种；林旭《晚翠轩集》；杨锐《说经堂诗草》；刘光第《介白堂诗集》；杨深秀《雪虚声堂诗钞》及《杨漪村待御奏稿》；康广仁《康幼博茂才遗稿》。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合集。张元济在序文云：

丙辰，余将谋辑《戊戌六君子遗集》，先后从归安朱古微祖谋、中江王病山乃澂、山阴王书衡式通、闽县李拔可宣龔、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谭复生、林瞰谷、杨叔侨、刘培村四参政、杨漪村待御遗著，独康幼博茂才诗若文未之或见，仅获其《题潘兰史〈独立图〉》绝句一首。屡求之长素，谓家稿散漫，且无暇最录，以从阙为言。然培村之文，经病山驰书其弟素久不获，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变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撼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阱，移陵埋谷，以祸今日；匪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晚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独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于天壤间，抑不得尽此区区后死者之责，循斯以往，将溷于丛残，旧文益不可辑，可胜慨哉！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剜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复生遗著尚有《仁学》一卷，《石菊隐庐笔识》二卷，兹编所录，止于诗文。丁巳初夏，海盐张元济谨识。（《张元济全集》第10卷第206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

梁启超称谭嗣同“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他特别欣赏《莽苍苍斋诗》中题麦孟华扇《感旧》四首之三，其一曰：“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臆胧业眼来。灯下骷骸谁一剑，尊前尸塚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倪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梁称赞“其言沈

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4月）谭的著作早有刊布。《莽苍苍斋诗》1896年（丙申）于金陵刊行，在维新人士中广为流传。辛亥年（1911年）谭嗣同的侄儿谭传赞以“谭氏重刊”名义，将其叔《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与《远遗堂集外文》三种重新刊布。

近代文献的辑印，有时并不比古籍顺利。林旭与李拔可为同乡友人，他的《晚翠轩集》文稿由李发现并于1905年首次刊行。李拔可后来辑印《墨巢丛刻》也收有此集，并在“丙子十二月”（1937年1月）写的序文中叙述得到林旭遗稿与流传的经过，也提到《戊戌六君子遗集》。文曰：

当瞰谷被逮时，闻其中笥尚有朱书票，拟暨与德宗造膝问对，又如家人父子之言者，亦皆散失，不可得见。越数岁，大舅沈公涛园，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粤东。予自江宁来别诸沪滨，忽于广大海舶行李中见一篋衍熟，视之，知为瞰谷故物。不钥而启，则晚翠轩之诗与孟雅夫人崦楼遗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请以校刊自任。岁乙巳，居崇川，事简多暇，为之付印一千部，分贻知好，转瞬辄罄。厥后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遗集》中，寝以风行。然私念瞰谷平时书札墨渌具在，纵论时事，臧否人物，有为一代兴亡所系者，宜与天下后世以共见。于是，复与林丈筱纶、郑丈叔昭、表弟沈剑知从事收集，重为《晚翠轩补遗》诗十三首，《崦楼补遗》诗十四首，并检涛园、冯庵二长者题记，辑为一卷，益以瞰谷手简及其应试文字，附卷末。嗟乎！是区区者，假令当日不邂逅于舟次，则瞰谷与孟雅夫人之余绪，足以传后而不朽者，或将展转散落，岂不更可痛耶？（李拔可《晚翠轩集·序》，1937年《墨巢丛刻》原书）

林旭遗稿的来由叙述甚详。商务版《戊戌六君子遗集》中的《晚翠轩集》显然按李拔可乙巳年刊本印行。《晚翠轩集》曾“三墨本”，以1937年《墨巢丛刻》版为备，除诗外，有“补遗”、“外集”、“遗札”和附录。

杨锐的《说经堂诗草》与杨深秀的《雪虚声堂诗钞》，丙辰之前都有刊本行世。前者有“蜀藏”版《杨叔峤先生诗集》，后者有光绪七年（1881年）《雪虚声堂诗钞》刻本。刘光第的《介白堂诗集》二卷，光绪癸卯（1903年）也有铅字排印本传世。唯独康广仁遗著最为少见，这也是张元济求助于康有为的主要原因。

康广仁（1867—1898年）传世之诗只有二首，其中之一即收于《遗集》中的《题潘兰史〈独

立图〉》，最早似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诗曰：“迢迢香海小阑干，独立微吟一笑欢。我亦平生心有事，好花留得与人看。”梁启超评论称其写观图时感受温暖深微，“其牺牲一身为后来国民幸福之心活现纸上，读竟怅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7页）潘兰史，即潘飞声（1858—1934年），号剑士，别署老剑、剑道人、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人，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张元济1944年撰写《为陈思明题康长素书札》也提到这位“长素门下士”。

东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难完。

只应沟壑供填委，土芥原一例看。

这是1952年12月张元济所撰《追述戊戌政变杂咏》组诗中的一首，诗注云：“四卿既诛，党人捕逐殆尽。有功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234页）记的即六君子遇害的事。六十年来，作者一直把对六君子的追怀记于心间，这种追怀经常袒露在他的诗文中。

当然《戊戌六君子遗集》是六君子合集，并非全集，今天《谭嗣同全集》的大部分、刘光第的《衷圣斋文集》等均未收入其内。前些年有人从旧档案中还发现了康广仁的一封《致星海先生函》，反映出他对清末官场苛敛厘金、贪污盘剥以致生民涂炭现象的疾恶如仇，与其亟亟要求更张旧法的情怀。（参见孔祥吉《康广仁早期思想的一件重要史料——读稿本〈致星海先生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星海，即梁鼎芬。但是，《遗集》却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六君子合集。1918年1月初版，于1937年6月出版“国难后第一版”。1966年10月，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书》，其中《戊戌六君子遗集》即按商务印书馆版影印，全一册，分布面精装与平装两种版式。

六君子以及康梁等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一大批变法维新弄潮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变法虽失败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今日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了借鉴和启发。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纪念日，听说商务印书馆将重印100年前的这部六君子合集，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翘首以盼！

2018年1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北窗下